

主编的话

牛年伊始，我受邀参加全国青联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扶贫团”赴河南南部山区。对我这样一个书斋学者来讲，切身感受一下中国开放改革的现实进展，遭遇一下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这正是盼望已久的机会。

初春还是那么寒冷，南下的火车带我们一行驰过辽阔的中原。出京门，过邯郸，下南阳。中原古地，当年金戈铁马厮杀的疆场，如今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腹地，成了中西部发展对比的试验场所。而这里，正是当年小平同志率刘邓大军数十万兵马进行中原逐鹿的主战场。在本世纪的下半叶，正是小平同志领导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第二次“决战”——不过，这次他是全局的总指挥。

我们正是，也不过只是这次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决战中的普通的一员。我们的生命与它相联，我们的荣辱与它相关，我们的信念被它所溶化，我们的志向被它所感染。

南下的一路上，我想着我们这套书。在筹划这套书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回答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焦点、

难点问题。我们有责任，因为我们是职业理论工作者。十一年中，我们的学者浸润在这一个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领域中，思考着，研究着，阐述着，与祖国的现代化进程同呼吸，与小平指引的改革总战略共命运。

改革18年了，我们亲身经历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伟大的变革。与前苏联的那种败家子式的“改革”相比，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禁为自己拥有邓小平这样成熟的杰出的领导人感到自豪。邓小平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中挽救了中国。

正如不少作者所论述、所预料的，我在河南南部的县里与干部群众座谈中了解到的问题，是那么迫切地要求有个明确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区别在哪里？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理据是什么？今天的意识形态战略要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它的出路在何方？我们的500家大企业的总销售额还不及日本三菱一家，为什么？下一个世纪，中国还能养活自己吗？……这些问题，正是日夜困扰着我们的啊！不仅领导者，不仅理论家，而且茶前饭后，在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我们也常常听到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组稿写作过程中召开过几次全体作者的会议。这些作者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导、所长、副所长，但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年无长少，学无先后。大家深切感受到了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英明，体会到中国取得今日之发展和成就来之不易。我们要万分珍惜这一历史机遇，为小平同志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继承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添砖加

瓦，维护它健康地朝前发展。这是我们这群作者的共识。在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很大、立场多元的情况下，我们不隐讳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或是改革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各种极端立场，抱着解决问题的、建设的心态面对我们的各种问题。左和右的极端都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们的学者从掌握的大量材料出发，有理有据地叙述了当前改革遇到的关键问题，并试图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出发，提出了种种选择。我们怀着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心情，企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我们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企图告诉我们的读者：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

改革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地去解决它、克服它，而不是因此消极对待它。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问题的真相是什么？比如失业问题，它为什么产生？它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轻重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对的办法是什么？学界提供的思路有效性怎样？从全局上了解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就不会轻易地情绪化地去对待了。

问题暴露得越彻底，展现得越深刻，说明改革发展越是走向纵深。这给一切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为了解决解放战争相持阶段的难点问题。道理是一样的。丛书所描述和展现的诸多问题，个个是难点，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实践正在进行，实践还没有结束。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问题研究、论述，提供解决问题的种种选择，不仅可

供领导者参考，而且也可供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如果可能，也可起到解疑答惑的作用。把前景和希望告诉群众，把困难和问题告诉群众，这就是将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与亿万人的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就是研究社会，特别是研究当代中国。但囿于学科分工，我们一直缺少这样的机会聚集一堂，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现在，今日中国出版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可以一册在手，全貌在胸。出这样的书，实在是好主意，好举措。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中国的学者谈论中国问题是应尽之职。这部书的作者虽然政治倾向相似，但由于视点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论述问题的提法可能会有差异，也可能有不妥之处，祈希读者提出批评。

丛书组稿的时候，正逢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但他开创的事业将会永存。我想，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尽可能地将前进道路上的问题研究透彻，阐述明白，给老百姓一个“说法”，为各级领导同志的决策提供一种参考——这是最好的纪念吧！

许 明

1997. 3 28于北京建内 5号

目 录

前 言	(9)
第一章 日渐模糊的文化地图	(29)
主调明丽的昨日世界	(32)
初期浪漫风	(32)
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35)
主调与交响	(40)
文化碰撞时代的来临	(43)
文化精英的反省与转变	(46)
民间流行的价值观念	(53)
飞地的狂欢与忧郁	(57)
文化重构与文化新语境	(61)
消费文化的兴起	(62)
精英文艺的迁动	(67)
民间的怀旧风	(73)
第二章 国家意志与主流文化资源	(77)
红色经典与世俗化旋风	(80)
又见《红太阳》	(82)
96金秋的红色狂澜	(85)
当代英雄神话	(91)
当代的英雄叙事	(92)
难以再现的英雄神话	(97)

第三章 今日时尚及领导者	(103)
从评介到话语实践	(105)
渗透与播散 从边缘到中心	(108)
后现代的颓然下场	(111)
幻觉文化的允诺	(116)
电视的意识形态	(117)
广告与幻觉	(119)
传媒与明星	(121)
传媒与知识精英	(126)
传媒与大众	(131)
白领趣味的流行	(134)
白领杂志	(138)
白领的文化形象	(144)
九十年代的青春梦	(149)
“文化打工族”与“准歌星”	(151)
“青春赌明天”	(155)
职业“球迷”	(159)
镜头里的乡村中国	(161)
对大众文化的检讨	(164)
第四章 天鹅绝唱与东方乌托邦	(179)
文化挫折与失望情绪	(182)
天鹅绝唱与集体凭吊	(183)
历史幻灭感及其叙事	(188)
闲适潮的兴起	(199)
批评的流失与批评家的退场	(206)
文艺创作的虚假浮华	(209)

乌托邦的东方挽留	216
“自我拯救”与“人文激情”	219
人文精神大讨论	222
“精神圣战”	224
“躲避”与“偶感”	227
理想主义与新理想主义	231
附录一：激进的理想与世纪之梦	241
附录二 百年中国：	
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	259
后记	279

前言

百年中国的最后后蒙之音

现代性的追求作为世纪之梦，在历史的隧道中已经回响了几百年，因此也成为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母题，作为民族求新求变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一直延续至今不衰。百年中国就是不断寻求变革图新的中国，除了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外，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思想文化冲突，构成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然而，我们发现，同样是思想文化的冲突，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它的内涵和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历史的渐进性发展，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们留下了相对从容的思考机会，这使得他们心态自信并且姿态优雅。因此，中学与西学，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思想文化冲突才不绝于耳。那时，言说者们大多以民族精英自居，都自信民族之梦将在他们的文化策略中得以实现，这种心态和话语方式一直延续至80年代中期。

1985年，在新一轮“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的热潮中，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上发表了《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认为，80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讨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

于中西文化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而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同时他认为，当前文化论争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传统问题，传统并不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世界’，而弘扬光大传统的 strongest 手段恰恰是反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知识形态、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于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现代心理、现代知识形态、现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全方位遭遇和总体性冲突。”^① 这种宏阔的“现代文化形态”虽然语焉不详，但从字里行间中都会让人感到作者勃发的激情和“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历史主体意识。与此交相辉映的是这本刊物的‘开卷语’，它开篇就指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 80 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它用语都是‘理所当然’‘必然’，这不容质疑的自信，分明让我们感到五四时代“少年中国”英姿的翩然复归。同时，它还以想象的、诗性的浪漫憧憬着‘创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崭新形态’并‘满怀信心地眺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会合的远景’。这气势和想象不能说不具有无比的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那一时代，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大都持有这样的心态和姿态。它是时代最具鼓荡力的声音，它表达了启蒙对象的渴望和想象，而它的声调，也相当吻合在革命的鼓角战歌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民众的习惯和口味。因此，将这种声音称为精英的启蒙之音是恰如其分的。

① 甘阳：《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 1987 年 6 月版第 7 页。

猝不及防的精神裂变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百年中国最后的启蒙之音,在世纪之交尚未莅临的时候,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所预言的一切并未如期而至,历史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啸而过。9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心境已判然有别,那宏大的宣言和慷慨允诺已晃如隔世。1991年,第一份具有民间色彩的、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学人》在京创刊。主编陈平原在‘后记’中说‘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

凭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学在民间’是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维持纲纪人伦和价值的重要支柱。与其临渊慕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力,这是近年来我们共同的思路。^①

即便是已经后退几十里下寨的言论,也是事隔一年半之后才公开发表,作者心存忧虑的是‘担心危及生存’,刊物的‘后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后记’。后来,在《文学史》第一辑的编刊后记中,作者又强调,他们“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大都是平正通达的研究,言必有据,据必可稽。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

^① 见陈平原:《关于〈学人〉》、《〈文学〉集刊编后三则》,载陈平原著《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作文的学术风气但愿能免,‘不贤识小’之讥。’^① 知识分子一反舍我其谁的强烈的入世情怀,而返身退回了书斋。用陈思和的话说,就是从‘广场’退回了‘岗位’。

不仅学院的知识分子如此,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感到了自己身份正被取代的困扰:“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性的明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和政治活动家取代。由于人们对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这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的兴趣消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一般原则: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大学成为培训班,成为社会生产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场。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② 与80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这就是历史发展渐进与断裂造成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进入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最初呼唤者,是向着这一方向变革的热情支持者,它不仅体现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同时也符合他们向往革命的内心需求。革命令人迷恋而沉醉,然而‘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

① 见陈平原:《关于〈学人〉》、《〈文学〉集刊编后三则》,载陈平原著《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② 李小兵:《市场经济与价值矛盾》,见《我在,我思》69-70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

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① 80年代呼喊的“反传统”文化策略，在90年代已自行瓦解，“传统”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构不成对峙性的力量，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合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具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而“现代文化形态”并没有伴随现代化的步伐同期而至。就连欢呼这个“众声喧哗”时代到来的评论家，也不得不以无奈的语调发出“无法整合的现实”的慨叹。

市场文化的出现与处境

但是，90年代的文化冲突，并非始于这一年代，在它的初始时期，由于强大的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领域曾一度出现空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大都表示了无言的沉默，知识分子独步的领域由于主角的退场而如沉寂的荒原。这时，鲜有政治色彩的、集中突现娱性功能的文化乘虚而入，谁也不会想到，大众文化竟是在这样的时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文化市场，琼瑶、三毛、席慕容、汪国真、《渴望》以及后来陆续被重新翻印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现代闲适小品风行一时，这些柔性文化以舒缓、轻松、温情、性爱等情感方式，在当代中国第一次以没有受阻的命运畅行于市场，受众也第一次被如此不可抗拒的温情所抚慰。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不作宣告的、不动声色的出场仅仅是90年代覆盖性的市场文化的开幕式。在不具备市场文化生产条件的90年代初期，是港台和历史作品充当了先期替代物，而当中国的市场文化获得了生产能力后，便如洪水泄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75页，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

闹，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不断更新换代，成为时代的文化主流。因此，90年代的文化冲突，市场文化以被动的方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市场文化由于功能和目标的规约，它并不主动攻讦其它文化，并不以斗争的姿态出现，甚至它的面孔相当妩媚和温和。

市场文化在90年代初期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这一现象本身隐含了它长期受到抑制的事实。激进的革命理想和一体化的精神处境，不可能为市场文化的生长提供空间。那“大众化”的文化策略，本身就隐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语义，在通俗易懂的表达策略中，有明确的教化内容。因此，那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市场文化，它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转译”形式，就这个意义而言，那消费性的、充满娱性意味的市场文化恰恰构成了它的对立面。“大众化”策略本身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它替代或填补了民众对文化娱性功能的要求；二是它浅显易懂，在不经意的娱乐中又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寓教于乐”，正形象地说明“大众化”文化的功能目标。它不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复制品，在长期的实践中，它形成了自己的经典系列，并成为不同时期厚重的思想文化资源，在需要的时候，它将被反复利用，并由于阐发而增添新的意义。1996年，中国文坛再次席卷的“红色经典”旋风，便又一次印证了上述看法。

但供市场消费的市场文化多为一次性，它以新奇、刺激、欲望作为主要特征。它的生产方式也与“大众化”的文化作品极不相同。后者主要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它有明确的“计划性”，所谓“国产重点影片”的提法，便是其中之一，而“五个一工程”更体现了这一计划性的规模。前者主要依据市场的需求，它投民众之所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因此，也可以说，今天谈论的市场文化，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曾

受到抑制，没有生长的可能和空间，除了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和排斥外，与计划经济的体制亦密切相关。

《废都》所反映出的

由此可以判断，90年代的文化冲突，市场文化以被动的方式成了主要的矛盾方面。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警觉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这种有趣的文化冲突，在80年代以前是不曾有过的。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特别愿意标榜自己的独立性或独立精神，愿意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而不是紧随其后。如果说他们也有强烈的介入欲望的话，那么他们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直接投身的方式。但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半时间里，由于具体的精神处境，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空间日趋陷落，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已成为他们不自觉的支配意识，另一方面，启蒙的精神传统和身份的优越，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背景。于是，社会历史进程飞速发展的步伐，突然中断了他们与历史的联系，精神处境大大改变了；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守恒力量，他们的变化是缓慢的，他们无法适应喧嚣的市场大潮所造就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的陌生、惊讶和隔膜，逐渐演变成了愤怒和批判，而他们指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发育并不成熟的市场文化，他们对这一文化形态的幻觉性、欺诈性、平面性和消费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一文化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指斥与批判置若罔闻，它在不置一辞中依然我行我素。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从民间萌发，一直体面地走上了国家的权威传媒，它在不同程度上宣告了这一冲突的结果。

市场经济从发生那一天起，就预示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必

然面临的窘迫。80年代，市场经济在不同的讨论中步履蹒跚，它的发展和走向常常处于情况不明之中。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于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情绪浓云般地笼罩在这个群体的心头，短时间里，他们几乎集体上演了一场“天鹅之死”。最典型的就是贾平凹的《废都》在1993年的出版。作品以强烈的失落情绪传达了人文知识分子无法获得自我确证的悲凉感和文化失败感，他只能在喧嚣的市声中随波逐流，并以极端的方式投身于世俗生活中。庄之蝶的心态和命运，在一个方面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

当然，知识分子的幻灭感，不止全部来源于对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的焦虑，也不止来自他们优越身份丧失后的失落。另一方面，它也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危机，这一危机的具体体现就是流行于学界的“失语”一词的大量出现。而事实上，所谓失语，并不是知识分子真的丧失了他们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重要的是，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过去，他们是社会良知的守护人，是社会价值的权威阐释者，起码在精神层面，他们的优越性是无人可比的。因此，知识分子才从从政与经商大有不屑之势。而时风的转变，使知识分子的这一优越感威风扫地，他们那毫无实用价值的、坐而论道的人生方式，迅即被民众和社会所忽略，他们失去了优越感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仅仅限于教师节或与他们相关会议的报道中。

在学术界大行其道的“西方中心论”

同时,自 80 年代以来,在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中,一种不作宣告的‘西方中心论’在学界大行其道,西方所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走马灯式地在中国又演练了一遍,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肇始的所谓‘新方法论’;一直到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以最新潮和先锋的面孔,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获得‘文化霸权’的地位。杰姆逊、德里达、福柯、拉康等成为最新的文化英雄和导师。操练者不顾理论原生的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只是一味地以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将其东方化之后,大肆渲染并用于具体的中国文化批评。多年过去之后,这一文化策略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和无力感,它们的解释力也越来越流于苍白,从而失去了有效性和听众。于 1995 年之后,这些来自西方理论的声音日渐稀薄,其实践者也在尴尬的境地中颓然退场。这一危机可能更为深刻,它表明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同时亦表明,单纯地追逐西方理论话语,同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因此,对西方话语的崇拜者和信奉者说来,这一挫折同样使他们深怀失败感和失望情绪。这一状况,被西方政治学家亨廷顿在 80 年代就预言过,他指出:“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变成历史的陈迹,随着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随着非西方社会中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随着主要西方强国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本土文化对于决定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现代化与西方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部